

如何設想一種 非檔案的資料本體論

文/余建勳

文明是一個服務於愛欲的過程，愛欲的目的是先把每一個人，再把每一個家庭，然後再把每一個部落、種族和國家都結合成一個大的統一體，一個人類的統一體。……但是，人類的自然的攻擊本能，個體對全體的敵意和全體對個體的敵意，都反對這個文明計劃。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 年 – 1939 年)

一、何謂檔案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1930 年 – 2004 年) 在著作《檔案熱：佛洛伊德印痕》(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中，透過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 年 – 1939 年) 所提出的精神分析學理論與術語，進而分析了人們對於檔案 – 檔案化議題的慾望、毀滅及其可能性，並且從此發展出自己相當獨特的檔案觀點。在這本著作中，德希達首先針對我們在漢語世界中經常提到的「檔案」、「檔案館」用法，就這兩個詞彙的對照翻譯「Archive」出發，往前回溯到「Archive」的詞源「Arkhe」，從而進行詞源學式的分析。德希達在這裡指出，「Arkhe」這個詞本身其實同時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含義，一方面這個詞可以是指依循著自然、歷史或本體論的「開啟」(commencement) 原則，另一方面這個詞卻又是依循著制度、權威和社會制度的「戒令」(commandment) 原則，而檔案便是這兩個原則相結合下的產物。但是實際上，面對這兩項相互對立的原則，人們往往只能先是透過訴諸法理的「戒令」原則，才能進一步窺看「開啟」原則的運作秘密。(Derrida 1-2)

在透過詞源學的方法揭示出檔案裡的這兩項基本原則之後，德希達表示檔案本身是某個人為了得到確認、詮釋或傳遞意義等等目的，所創建出能夠不斷回頭追溯至本源的回憶載體。這裡的本源，其實指的就是在自然、歷史或本體論意義上延展開的原初意義之源頭。但是相對於這個基本上與普通觀點其實沒有多少差異的檔案理解，德希達隨後把「檔案」這個詞彙的起源帶到更少人觸及之處，也就是往前追溯到更久遠以前的古希臘文字「Arkheion」。在古希臘的使用語境中，「Arkheion」這個詞彙的意義，指的是那些高級地方官、執政官居住的住處、住家。對此，德希達提出一個奠基在這個詞彙意義的情境想像，也就是一個擁有制定法律權力、以及本身象徵法律權威的市民或官員，能夠直接在自己居住的住家中保管有大批檔案，並且直接對這些檔案進行閱讀、整理、分類等後續的處理工作。換句話說，這個人不僅僅是要確保存放這些檔案之載體的有效性與安全性，同時他本人其實也直接擁有了監管、整理、詮釋這些文件材料的權力。正是在這樣的情境基礎上，德希達相信檔案本身更為重要、且更為不為人所熟知的秘密，就是在於當人們把各式各樣的記憶內容集合起來的同時，必須先行為這些檔案提供特定的技術載體與存放場域，並且在涉及不同權力力場的場域競逐之中，針對這些檔案材料進行控制、保管、分類與詮釋等等處理工作。(Derrida 2-3) 換句話說，檔案的權力問題涉及到載體技術、保管分類、意義詮釋等等層面上，而這就遠遠超出於原先的檔案是單純為了追訴原初記憶的含義。

在這裡，我們其實可以見到德希達已經將原本從詞源意義延伸出來的「開啟」原則和「戒令」原則，進一步擴大成為指涉檔案內部的兩個截然不同的特性重點：一方面，檔案承繼了「開啟」原則，其本身是單純作為外在於人體之外的記憶載體，其存在的目的是人們為了能夠藉由某種技術能力，往前追溯過往「原初」記憶的特有情境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檔案本身除了單純是各式各樣物質載體、技術方式所串接的集合體之外，同時在其身上必定會存在著與其自身有著密切相關的權力結構，並且就在這個權力層面上同時涉及到集結、存放、管理、分類、詮釋等關於處理檔案的工作。實際上，檔案的蒐集、建立、分類、詮釋等等過程都會直接影響到這份檔案的有效性，甚至直接對於檔案的定位與性質產生影響。在這個基礎上，德希達表示藉由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之協助，將會徹底動搖有關檔案秩序裡原有的種種被預設出來的疆界、邊界，從而讓我們有機會再度思索檔案建構背後的各式原則、系譜、權力或者合法性問題，以及進一步建立出有關戒令原則是如何賦予材料命名、分類等權力的檔案科學。而在文章的註腳之中，德希達更是不諱言地提出如果人們沒有針對檔案、記憶展開控制，就沒有政治權力的問題。(Derrida 4)

在德希達看來，在人們不斷趨向體制化、檔案化的欲望之下，檔案的建立、分類、判斷和鞏固相關權力的重要性，早就遠遠大於過往狹隘的原初記憶載體的想像。在這裡，檔案始終無法是一種能夠自發性、有機性和內在性產生歷史意義、過往記憶的裝置，反而更常是為了要去彌補早已失落的原初記憶及意義結構崩潰之下的產物。但是，在經由「檔案」的詞源意義推導出來的二重性質之中，為何有關失落的原初記憶或結構崩潰的問題會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呢？同時，我們又應當透過什麼理論框架來理解檔案－檔案化背後運作的欲望機制呢？在這裡，德希達則是首先回應了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著作《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之中，佛洛伊德提到自己對於人類心理地誌學之觀察的檔案紀錄情況。在《文明及其不滿》這本著作中，佛洛伊德發覺到人們在文明社會中長期壓抑了自身的進攻性傾向。其後，他突然在該書第六章開頭返回到自己整理這些相關資料的經驗：

在以前的著述中，我從來沒有這麼過現在這麼強烈的感覺——我覺得我所描述的都是些眾所周知的東西，為了說明那些事實上不言而喻的東西，我在浪費紙張和筆墨，總有一天還會耗費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勞動和材料。因為這個緣故，我很高興能見到下面的情況的發生，即如果承認有一種特殊的、獨立的進攻性本能，這就意味著關於本能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發生了改變。(佛洛伊德 174)

對於德希達來說，佛洛伊德在這裡的自白其實是一種相當狡猾的理論修改與方向轉換。原因在於，佛洛伊德透過大量文字筆墨來提到病患病情或者人類社會觀察狀況，確實就是意味著其需要浪費大量的檔案文件；但是在這之後，他的解決方式是立即重新回溯到自己過去對於精神分析學理論和案例的解釋與判斷，並且表示自己必須在這過程之中加入新發現的原創東西，即便這意味著自己原先的理論體系會面臨到劇烈地改變與斷裂。在這個過程之中，佛洛伊德坦承自己其實早在《超越快樂原則》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的文章之中便已經提出死亡驅力 (Todestrieb, death drive) 的想法，但是當時對於這個概念有所排斥與遲疑，同樣地也獲得當時同時代的人的不同意見。然而到了《文明及其不滿》，佛洛伊德重新正視自己過去曾經提出的死亡驅力原則，並且將之視為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參數之一。(Derrida 9-10)

而德希達注意到什麼事情呢？德希達認為佛洛伊德其實在兩個部份面對道死亡驅力的問題：一方面是佛洛伊德透過從人們個體心理病例至整體社會發展情況之間，其實都存在著某種不斷趨向寂靜、毀滅、死亡的傾向，因此希望透過把這些發生自不同面向的現象案例以檔案化、文字紀錄的方式加以彙整，並且進一步嘗試整理出整個人類心靈背後存在著一種尚未被確認的驅力——死亡驅力；但是另一方面，德希達還注意到佛洛伊德在把這些種種情況加以記錄的檔案化過程，其實本身同樣地面臨到一種現實觀察情況無法透過既有理論有效地解決、闡述的情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導致佛洛伊德感到氣餒，但也是為了迴避這種情況迫使佛洛伊德必須重新組織自己的檔案化方式，在這裡我們可以說佛洛伊德其實就直接面對了摧毀檔案自身的驅力——死亡驅力。

在這裡，比起過往佛洛伊德研究中經常提及的對於文明社會的觀察，德希達把重心放在佛洛伊德在將這些觀察加以檔案化時所面臨的困境，也就是光是檔案化的過程本身並非必然能夠完滿進行閱讀、分類、整理、詮釋的，而這非是因為基於某種技術限制、對象特性所無法克服，而是檔案化的過程本身就是存在著一種內在於其自身的「自我不滿」，並且等待著特定時機重新迫使人們必須重新思索檔案。同時，德希達明確把自己的「檔案熱」概念，與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學裡的「死亡驅力」術語相結合。在德希達的詮釋那裡，死亡驅力不斷地要人們針對記憶展開回憶、追溯、製造的檔案化工作，卻不斷地要求人們徹底地遺忘、消解、毀滅那些能夠協助記憶或回憶的檔案內容。對此，德希達提到：

死亡驅力並非原則。它甚至威脅到每一個公國、每一個執政優先性、每一種檔案慾望。這就是我們後來所說的 *mal d'archive*，檔案熱。(Derrida 12)

有關檔案本身將會不斷製造自身消亡的「檔案熱」的說法，迄今已經成為藝術文化圈另一種相當流行的思考框架，也是我們針對檔案進行思考的重要資源。不可否認的是，德希達提出檔案本身藏有一種反覆朝向死亡的驅力，而這種死亡要素又不斷吸引我們進行檔案化的說法，確實有著其正確之處。但是在另一方面，至今我們關於佛洛伊德死亡驅力的討論，卻又在某種程度上再度被名為「檔案熱」的「大寫」檔案化重新掩蓋。我們正在討論死亡，但始終未真正思考死亡的深淵。

二、何謂資料

在當前數位科技的時代，我們要如何進一步延伸德希達在《檔案熱：佛洛伊德印痕》中的論述，特別是從一個自身不斷走向寂靜境界的死亡驅力脈絡出發呢？或許我們可

以從一個與檔案息息相關，但是在定義和詞源上完全不同的東西推展，也就是「資料」(Data)。在這裡，我們可以提出一個經驗性的觀察，即今日人們對於資料的理解深受到資訊技術的影響，使得我們將資料視為是針對現實社會空間（無論這個現實社會空間是物理性質的、心理性質的或者虛擬性質的），透過一種相對極為客觀的蒐集技術，進而採集到的大量數字化、單子化呈現之成果。在這個過程之中，這些結果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對於現實社會在特定情境之下採集到的潛在的科學真實，並且往往能夠映照出特定的真實情境。但另一方面，即便某一種程度上來說這些數據並能完全不代表現實情境，卻又往往會被視為已經獨立的存在物進行討論。但是相較於「檔案」(Archive) 這樣的概念至今可以明確見到其原始含義象徵的意涵，今日「資料」(Data) 的理解本身則是相當程度上受到數位科技生活的影響，而讓我們難以確定那些概念是承繼於過去用語，又有哪些概念是受到不斷發展的技術能力影響。

幸運的是，丹尼爾·羅森堡 (Daniel Rosenberg) 在為論文集《「原始資料」是個矛盾修辭》(“Raw Data” Is an Oxymoron) 撰寫的文章《事實前的資料》(Data before the Fact) 中，則是詳細地對於「資料」(Data) 的用法習慣提出詞源學的研究成果。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當前對於應漢語世界字詞「資料」或「數據」的英語詞彙「Data」，其實本身就是源自於拉丁語「Datum」的複數形式，而「Datum」又是動詞「Dare」的中性過去分詞。不過在拉丁語中的「Datum」這個詞彙本身，又有當人們在面對各式各樣不同爭論的時候，提出可以被眾人認為是理所當然之東西的意思。不過在這個地方，「Data」這個詞彙與著同樣出自於拉丁語動詞的「Fact」、「Evidence」已經有著本質性的意義區別。我們可以這麼說，「Fact」強調對應於一種具有全面普遍性、不可質疑的真實，基本上是涉及到本體論的領域；「Evidence」則強調在人們判斷過程中參照的座標材料，基本上是涉及到認識論領域；然而如同前面所述，「Data」處在一種更加奇怪的處境之中。一方面，「Data」並不一定是具有如「Fact」指涉到全面普遍性的真實，而是將自身僅限制在被大部分人認為是真實的東西即可；但另一方面，涉及到修辭學。反而言之，「Data」最初的使用與強調已經完成、發生或存在的本體真理不同，它是一個獨立運行的詞彙概念。(Rosenberg 18)

根據羅森堡針對大量古文獻進行搜尋式考察，在英文世界那裡，最早是英國《牛津英語詞典》在 1646 年開始使用「Data」這個詞彙。在當時，英國牧師亨利·哈蒙德 (Henry Hammond, 1605 年 – 1660 年) 在其撰寫的神學教義問答中，首次寫入了「大量資料」(a heap of data) 的用法。在這裡可以見到，哈蒙德所謂的「大量資料」絕對不是意味著蒐集到的大量數字調查成果，更與後來所謂的大數據 (Big Data) 完全沒有任何關聯。哈蒙德在這邊提到的資料，其實就是一系列在不同主題的爭論過程中，應當被自動接受為真理的重要神學命題，例如神父應該號召祈禱、禮拜儀式應該嚴格遵循等。(Rosenberg 19-20) 很明顯地，這一概念完全與今日的使用法截然不同。其後儘管「Data」這個詞彙在 17 世紀並非經常出現的用語，但是當時的人們其實已經會在特定幾個學科範疇中使用。例如在神學領域，類似於哈蒙德基於宗教議題爭論的用法，「Data」明確是指在天主教或基督教神學討論之中，唯一至

高的上帝透過《聖經》賦予人們的真理。這些名為「Data」的真理因為源於上帝或《聖經》而不容質疑，且同時涉及到整個世界的原則和事實。

因此，儘管 17 世紀的人們已經提出「歷史資料」(historical data) 的用法，但是這邊的「歷史資料」仍然並非是今天基於歷史經驗主義的範疇進行討論，仍然是指上帝賦予歷史學家確定歷史方位的真實和原則。關於這部分，我們其實可以回溯當時歷史學家的作為。當時大批歷史學家並非真正地統整過往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歷程，而更多是嘗試把各式各樣主要的歷史事實與《聖經》資料加以結合，進而向其他人說明未知的事物。因此，這時期的「Data」的用法大量使用在當時流行的年代學(chronology) 討論之中。同樣在數學領域，「Data」則是繼續維持著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 前 325 年 – 前 265 年) 的技術含意，也就是數學問題之中的量(quantity)、及簡單論證時的代數。而在哲學和自然科學領域，「Data」則是指不容爭辯的事實和原則。(Rosenberg 19-20) 總體而言，這時期在神學、數學或其他領域使用的「Data」本身並不意味著某個本體論主張，而是經由不同論證慣例提出的「既定事實」。換句話說，這個詞彙的使用往往是對應於辯論之間的解決方案，並且試圖把已知與未知的事物都納入體系之中。

但是羅森堡指出，在英國數學家約翰·科爾森(John Colson, 1680 年 – 1765 年) 針對發現和發明進行區分的文章中，開始替「Data」一詞所指涉的意義或公理提供了理論基礎，也就是人們透過某種特殊的設計方法所發現到的事實。(Rosenberg 21-22) 實際上，英語世界的人們在 18 世紀開始，便已經對「Data」這個詞彙發展出完全截然不同的意義轉向。在 18 世紀初，「Data」從原先作為一種在爭論之中無法質疑的論證基礎之涵義，這個詞彙的使用在神學、數學等著作之中出現的比例迅速減少；相對地，「Data」在醫學、金融、自然歷史、地理等等著重經驗、觀察方法所撰寫之著作中，則開始獲得普及使用。至此，「Data」的意義已經轉變成經由實驗、經驗或蒐集等各式方法彙整而成的成果。(Rosenberg 32-33) 換句話說，這時期資料的主要涵義已經不在是過去人們辯論論證時的不可爭議之前提，而是經過特定研究、考察技術之後產生的結果。

在這裡，我們可以另外參照許煜(Hui You) 對於資料的概念研究。許煜提到，這時期的資料應該要注意到其具有從某種現實中取得之東西的框架，對於哲學體系來說便是指對於感知材料(sense data) 的理解。因此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之間的區分，其實就是人們要如何對待資料的探討，例如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 1711 年 – 1776 年) 強調資料的組織必須透過因果、鄰近、相似等關聯原則，而德國哲學家的伊曼努爾·康德(David Hume, 1724 年 – 1804 年)。不過對於 18 世紀到 19 世紀的現代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來說，儘管這樣的這樣的「Data」詞彙使用情況和領域不斷地增加，但是新發展的詞彙涵義其實遲遲並未造成相當巨大的文化影響力。或者更進一步地說，有關資料意義概念的轉換更多是隨著哲學討論典範轉移、衝突而進行的關係轉換，隨著不同思想體系而剛好在不同的意義之上，但是這樣的思想體系之衝突相當大程度上地掩蓋了整體人們對於資料概念的運用。

一直要到了 20 世紀上半葉，伴隨著相當大量的統計學應用發展興起，「Data」基本上已經成為確立其自身的新興概念。在這個時期，資料也更大程度上與數量現實結合在一起。一直到電腦和資訊科技興起後，原先在 18 世紀確立的「Data」概念重新獲得不同的意義，反而更加與整個電腦與網際網路技術之運作結合，朝向在具有廣泛傳播和存檔之資訊的概念。對於許煜來說，他的研究範圍便是試圖在電腦資訊已經蓬勃發展的今日，理解資料本身是如何成為沒有脈絡的自身存在，或者可以說是如何發展出一種名為「技術物的存在論」。許煜大致正確地指出了，資料的概念其實分成兩種體系：一種是過去延續著拉丁語「所給出的（物）」的脈絡，所產生出來的由某種提供無可質疑之物的「Data」；另一種則是仰賴「後設資料圖式」（metadata schemes），進而賦予自身語意或功能性的結構資料，或者以許煜的說法便是「數碼物」。

但是我們認為，即便是針對資料的存在論（Ontology）展開的發展與討論，整個資料概念的發展歷程之中存在著是多重路線、彼此交錯、互相影響的發展路線。也就是說，整個資料物至今其實並未脫離在爭議之中不可質疑之物的方向，特別是至今人們仍然相信著透過各式技術而彙整出大量資料是討論或論證的前提基礎，並且資料是足以超越現實表像生活的獨立產物。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參照到羅森堡是如何區別事實與資料之間的關係：

正如事實可能是證據一樣，資料也可能是事實。但是，從其最初的白話表述開始，資料的存在便獨立於任何相對應於本體論真理的思考。當一個事實被證明是假的，它就不再是一個事實。但是虛假資料仍然是資料。(Rosenberg 18)

同時透過諸如觀察、實驗、紀錄等後設技術組織資料本體存在的方法，同樣可以重新回到更早之前資料概念進行發掘。特別是當我們應該重新回到詞源檢視，即資料或數據本身就是一種修辭性的概念，因此即便是在最原初的定義之中，也不應該直接資料視為是一種普通的存在物，或者直接與現實生活、自然環境進行連結。我們應該這麼說，如果說資料的原初定義其實就是為了在人們爭論之中提出不可爭議之物，那麼它的存在並非是因為它是完全不可爭議之物，而是整體技術環境在那個時候必須存在著不可爭議之物，而其命名便是「資料」。

不過人們逐漸注意到技術本身對於資料的影響已經不是單單收錄的內容範疇，而是涉及到整個技術發展自身，這確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方向。我們可以延續著德希達和許煜的哲學脈絡，也就是說如果各式技術本身是與資料緊密相連的，那麼這個操作方式又與和技術緊密關聯的檔案有何差別？對於德希達來說，技術本身其實就是組織檔案－資料的關鍵因素，而在這部分又會牽涉到諸多權力問題。德希達強調雖然沒有安全存放的地方、沒有重複自身的技術、沒有一定的檔案外部性，那麼就沒有檔案，但是這個檔案卻又會不斷因為先天性的死亡驅力反對自身。(Derrida 11-12) 但是另一

方面，如果檔案之中處處面對著死亡驅力的威脅，那麼資料的因應方式同樣遭遇到死亡驅力的威脅嗎？或者我們可以提出另一種看法，將那些受到死亡威脅的東西都歸於某種「檔案型」的理念範疇，而將德希達重新提出的死亡驅力概念統整到一個新的概念之處，例如可以獨立於事實、真實之外的資料？無論無何，資料本身的死亡問題已經莫名其妙地遭到「湮滅」，而這也是下面要開展的工作。

三、死亡驅力

在《檔案熱：佛洛伊德印痕》那裡，德希達提出幾個我們應當要注意的事項。首先，佛洛伊德在其著作之中承認了尚未確定型態的死亡驅力並非只是一種在社會大眾之間具有爭議性的假設，而是一個應當與必然性（Ananke）加以連結的概念。佛洛伊德把這種不可還原、原初的驅力賦予了「死亡驅力」、「侵略驅力」、「毀滅驅力」等稱號，而這些稱號也象徵著這個驅力的某種外顯出來的特性。不過儘管死亡驅力並不會在在個體的行為之中直接發現、破譯，又或者無法被人們以各種文獻直接地記錄下來，佛洛伊德認為我們仍然有機會透過對於種種不同的行為趨勢的分析，觀察到內部潛藏著的死亡驅力之存在。而在重新追溯佛洛伊德提出死亡驅力的過程之後，德希達認為死亡驅力除了有著不斷驅動著人類個體與社會集體往著某個特定寂靜方向前進的動力外，其實也不斷在自身沉默之中摧毀了任何與死亡驅力有關的檔案材料，即同時抹滅了本身具有、或者潛藏的意義、自身所處的情境、以及任何有關於自己的蛛絲馬跡。(Derrida 10-11)

但是相對於德希達明確把「檔案熱」建構在佛洛伊德的理論基礎上，確實如同佛洛伊德自己陳述、以及德希達所觀察到的，佛洛伊德本人對於「死亡驅力」的概念始終處在游移不定的理論抉擇狀態。在《超越快樂原則》之中，佛洛伊德是透過「死亡驅力」來解釋為何人們的心理系統並不會只是單純依循著快樂原則（追求釋放累積下來的興奮來促成心理能量之平衡）和現實原則（追求保存自身而暫時忍受令人痛苦的能量），而是不斷地反覆、甚至呈現出一種強迫式重複原初的創傷經驗情況，而這種情況反而更像是故意增強能量衝突和自身瓦解的危險處境。也因為對於種種案例的觀察，佛洛伊德不得不設想出存在著一種要讓生命體回歸至無機體狀態的死亡驅力。但是儘管佛洛伊德在晚年相當重視「死亡驅力」的概念，但是相關思想卻被後來許多精神分析學家選擇性地忽視。

在這裡，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是，儘管佛洛伊德自己對於「死亡驅力」概念並非基於生物學事實，而是人類的精神結構對於追求快感、自我保存、人與環境和諧相處等等既有框架的超越，進而不斷經歷非特定目的性的重複自動化（automatism）歷程。(Žižek, 2002 年, 6-7) 而對於法國精神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 1901 年 – 1981）來說，死亡驅力則被進一步發展成一種直接涉及到存在論的構想，而非僅僅是關於心理學或生物學為何會趨向死亡衝突的討論。不過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1949 年 – ）指出的，即便是在拉岡那裡，雖然死亡驅力與象徵秩序之間的關係大致上已經被視為一個人們存在的基礎模型，但是透過對於死亡驅力與能指之間不同闡釋與引證，實際上我們還是可以為整個拉岡的教學階段區分

出三種不同涵義的死亡驅力概念：(Žižek, 2002 年, 180)

在第一個教學階段中，拉岡在早期文章《言語與語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與範圍》(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一文中，當時主要參照了由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W·F·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 年 – 1831 年) 提出的現象學概念，並不斷重複強調精神分析學處理的問題是處理意義的領域。這時期的拉岡認為隨著事物真實因為不斷的符號化落入整個象徵 – 文化網絡之中，意味著早已經死去、沒有生命力的詞語和概念，謀殺了原本應該以充滿生機方式呈現出來的事物本身。換言之，詞語和概念而不再是直接的物理現實。因此，我們始終無法返回到直接物理現實中的事物，而從詞語呈現出來的表象總是有著先行的短缺，因而詞語暗示了事物的缺席。(Žižek, 2002 年, 180-181)

在第二個教學階段中，拉岡透過其對於美國作家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 年 – 1849 年) 的偵探小說作品《失竊的信》(Purloined Letter) 進行解讀，開始將精神分析學理論所要強調的重點，從前一個教學階段的單詞、言語對於實在世界的抹滅之重視，轉向到存在著共時性的語言結構問題之上。基於當時相當盛行的「結構主義」的語言觀，拉岡認為語言其實就是佛洛伊德不斷提及的無意識自治系統，並且是一臺自行製造意義的機器。正因為如此，拉岡提出無意識如同語言般結構的這個相當著名之說法。在這裡，拉岡認為死亡驅力其實等同於語言 – 象徵秩序本身，拉岡甚至形容死亡驅力「不過是象徵秩序的一個面具而已」。因而我們可以知道，這時期的拉岡是把死亡驅力的問題與語言 – 象徵秩序、無意識的強迫重複性等運作機制緊密結合在一起。拉岡認為，人們所謂的意義體驗其實是劃分在想像界的範疇，並且受到不斷尋求動態平衡的快樂原則支配著；反之，不斷製造出體驗意義的無意識能指和所指之意義機制(signifying mechanism)，則是透過自動調節的象徵秩序干擾這一自然性的動態平衡，這就是「超越快樂原則」的領域。在這裡，落入能指網絡的人們必須接受禁慾效果，並透過強制性重複成為這個自治秩序的一環。(Žižek, 2002 年, 181-182)

但是到了第三個教學階段中，拉岡開始把自己長期以來的精神分析教學重點，轉為放在原先設定作為闡釋之不可能性的實在界上面，而死亡驅力也因此徹底改變了原先所具有的含義。在這裡，承繼著前面無意識被認定是「像語言一樣」建構起來的結構，快樂原則便是在整個語言 – 象徵秩序裡支配著無意識的轉喻 – 隱喻置換之「原始過程」。但是儘管象徵秩序試圖順利達成心理的動態平衡，但是在這樣的符號化的過程中，總是會存在著真正無法遭到象徵意義闡述的內核、殘餘，並進而產生著某些不斷迴返、強制重複的陌生性創傷因素，這就是死亡驅力所產生的效果。為了能夠闡釋這些不能夠被符號化、不能被納入象徵秩序，且作為不可能快感之化身的神秘內核，拉岡重新運用了佛洛伊德曾經提出過的精神分析學術語：原質(das Ding, Thing)。(Žižek, 2002 年, 181-182)

這三種變化其實代表著到拉岡在其不同時期精神分析理論發展過程的重心轉移，也就

是從原先重視意義對於人們來說是如何產生的現象學方法，轉換至強調共時性語言早已存在的結構主義觀點，並且在後期更進一步把自己的理論脈絡深入至對於不可描述、不可迴避之實在界 (the Real) 的討論。但是我們不應當過度強調這樣理論視角轉換的差異，或是將其直接視為是一種認識論的斷裂、或者一種不斷否定過往理論的創造性理論生產過程。更廣泛地來說，無論是佛洛伊德、拉岡或者是齊澤克，其實在他們提出種種有時緊密相扣、有時卻又似乎存在歧義的論述之中，我們應當將之視為對於不可直接知悉的實在界之探索。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正是因為人們對於實在界這種無法直面的概念難以直接進行描述、框架，因而我們只能透過各式各樣的案例旁敲側擊，並且在不斷地強迫式重複性論述中側面理解之。也就是這個方面，我們將能夠理解為何德希達要將檔案－檔案化的工作與死亡驅力加以連結，並且提出佛洛伊德整理精神分析學說檔案所處的困境。

如果以拉岡的三種時期進行參照的話，德希達理解死亡驅力的方式可以如何進一步理解呢？如同前面所述，德希達的死亡驅力大致上可以理解為不斷強制出現的重複性，這種重複性同時造就人們不斷地生產檔案，但是卻又是象徵著這個檔案本身存在著不可能性。從這個觀點來看，當某個事物確實能夠透過外在於自身的檔案，產生出某種有關於其自身的穩定意義之時，那麼這些意義也至多只是一種自發地、具有生命力的、且內在於檔案材料的經驗意義，而永遠不會真正追溯到那個已經無法迴返的原初記憶或回憶之中。因此，檔案引發的正確與否，在邏輯層面上始終是一種比較的邏輯上，而非是重複、返回原初經驗的過程。但是在原初記憶或回憶的意義不可能實質再現的地方下，我們所謂的「檔案」便始終是、也只能是發生在原初記憶和構築記憶的情境。在德希達看來，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臨床過程之中觀察到的重複強迫 (wiederholung-szwang ; repetition compulsion) 邏輯，也就是病患不斷重複著自己心靈記憶、失憶的過程，其實就證明了檔案內在的慾望動力及死亡驅力存在，且這兩者之間有著相當緊密關係的互動。但是如果就整個記憶動力機制來說，真正驅動他們的並非是因為人們同時存在著記憶與失憶這兩種彼此相矛盾的兩種驅動力，而是全數都應當歸咎於死亡驅力本身。

四、永生之物

要注意的是，被拉岡稱之為「死亡驅力」的那種怪異運動，不應該與其他概念相混淆。例如，死亡驅力並非是為了要去探詢已經喪失的原初之物，因而產生對於局部客體的無限渴望，並且因此有著相對應的運動過程；同時，死亡驅力也不是那種遭到象徵秩序阻止或者破壞的普遍亂倫性原質 (incestuous Thing) 衝動，亦不是某種無法徹底實現的「總體性」自我摧毀意志。不可否認的是，上述的幾種想像確實是與拉岡的精神分析學理論有著其理論基礎，然而往往是與慾望 (desire)、幻象、力比多等概念直接相結合的運作說明，但並未能準確說明死亡驅力的要點。不過這樣的多種概念彼此交錯的拓撲式混淆，其實可以歸咎於拉岡在其理論發展階段，不斷對於自身字詞的含意加以推進與改動，例如我們前述提到死亡驅力在不從教學時期的改動。

如同齊澤克所說，如果我們要更為明確定義出「死亡驅力」的運作方式，我們可以把

死亡驅力本身設定成為是一種基於「固著」本能的運動，這種固著本能試圖把所有位移重新拉回到原始位置，因此產生另外一種反向的作用力。而正是因為這種固著運作基進地、頑固地堅持拒絕任意變動，導致每一種驅力的「死亡」維度便是基於這種固著運動本身。從這個角度來看，死亡驅力的基本架構並非單純是那個要超越出所有客體、走向原質的空位（相對地，在幻象結構中就會強調各式各樣客體試圖填補這個空位的不可能性），而是人們堅持「固著」於某個特定空缺，並且永遠圍繞著這個空缺旋轉的動力。而因為這個慾望的動力與驅力的固著效應，才使得我們可以將驅力理解成是直接製造出「喪失」（分裂、缺口、距離）的那的動能。（Žižek, 2014年, 106-109）

正是在這個地方，儘管慾望和驅力在拉岡的精神分析學說之中有著相當緊密的關聯性，我們應當在此重新提出兩者之間其實存在著一種本體論上的差異。慾望本身是基於構成性匱乏（constitutive lack）為自身組成的基礎，我們可以將慾望想像成是在一個空間之中存在著某個空缺，而這個空間渴求著某個客體去填補這個空缺；然而驅力則是圍繞著存在秩序（order of being）中的缺口旋轉，其中空間秩序在這個點位（point）上開始瓦解，齊澤克便將其比喻成為「黑洞」。從這這一點發展，我們應當重新注意到德希達在《檔案熱：佛洛伊德印痕》中觀察到的檔案化慾望及死亡驅力，並進一步做出展示出這兩種分別。首先是人們對於任何材料的檔案化慾望，並且轉換成透過不斷將尚未賦予意義的東西透過各式分類、整理、存檔等技術，加以透過意義確立下來的慾望。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可以將這些視為一般意義上的慾望動力，也就是透過一個客體（檔案）去彌補一個空缺（預設還沒確立下來的空間）。

在這裡，慾望主體（subject of desire）對於他者慾望和短缺的回應，主要是以幻象的方式顯現出來。不同於通常定義的「為了實現、滿足慾望而想像出來的象徵場景」，幻象場景真正的作用在於建立了人們慾望的坐標系，透過這個調整框架能夠提供各式各樣的欲求客體，進而從人們身上構建出變態慾望（perverse desire）和過度慾望（excessive desires）。（Žižek, 2014年, 104-105）在這裡會出現一個相當經典的悖論：慾望本身就是對慾望的抵禦。幻象構建出針對他者的慾望，而其目的在於抵禦、克服、隱藏以「純粹」形式表現出來的「死亡驅力」。（Žižek, 2002年, 165-166）但這並非死亡驅力的運作方式。

因此，我們應當注意到德希達所謂的死亡驅力本身，並不應該只應該停留在意義層面的討論，而應當是這種文化－象徵秩序介入本身便自動會產生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死亡驅力。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切「文化」、「歷史」、「檔案」都是某種象徵的創造性構成（creation-formation），亦是透過限制、教化來對抗失衡之創傷性內核的過程，從而向人們保證擁有最小的一致性。而正是透過這樣的對抗關係，人們切斷了自身與自然、動物原始平衡（animal homeostasis）之間的聯繫。（Žižek, 2002年, 7）在這裡，死亡驅力確實是無可爭議的東西，一個無法更多準確描述的無可爭議之物。驅力在這個循環運動中採取怪異的彎曲空間（curved space），而其達到目標－客體的途徑便是圍繞著目標旋轉。（Žižek, 2014年, 104-105）而正如前面第二章所說，

資料始終是在同樣方向之各式各樣的爭論中，普遍被預先認定為不可否認、質疑的項目，同時也是成為不同檔案最終將會迴返的基礎。換句話說，如果檔案本身其實存在著多種版本的檔案，那麼資料可以視為是這些種種不同版本檔案的迴返之處。在這裡，我們應當接續第二章提出的資料特性，把死亡驅力的構想視為一種資料 (Data) 的本體論概念，也就是一個同時作為檔案本體最為固著元素，卻又是同時作為獨立的喪失缺口。在這裡，資料本身既是對於真實最為貼近、也不斷重返地項目，卻也是對於檔案本身最大的挑戰。

相較於所謂的現實是透過象徵性認同和想像性認同構建起來的產物，那麼死亡驅力作為象徵秩序的對立物，便是對象徵秩序進行全面抹滅，暗示著「第二次死亡」、「象徵性死亡」(symbolic death) 的可能性，這也是德希達檔案熱真正的破壞潛能。而這樣的破壞的潛能不僅僅只是對於檔案紀錄的破壞、或者是標記著意義闡釋之不可性。因為無論是在佛洛伊德或者是拉岡那裡，所謂的死亡驅力並非單單是指某種渴望自我消滅的傾向，也不是「現實客體」在象徵界中的死亡，而是指涉整個網絡存在的自身毀滅。(Žižek, 2002 年, 182) 當就有的文化－象徵世界遭遇到整體性破壞或合法性挑戰的時候，其實就是意味著「絕對死亡」、「世界的毀滅」來臨。在這裡，不應當把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視為一種人格化的強制力量，而應該將其視為持續推動著已經擴張的自我繁殖 (expanded self-reproduction) 進行永不中止的循環。其中，死亡驅力的目標 (aim) 就是不斷圍繞著循環的客體－空缺，而這個驅力的目的 (goal) 則是讓這個循環永不終止。(Žižek, 2014 年, 104-105) 因此，死亡驅力是死亡的對立面，是對於「不死」永恆生命的稱呼。在這一部份，主體在內疚和痛苦中形成永無止盡的反覆循環，成為超越生命與死亡、生成與崩潰的「不死」命運。(Žižek, 2014 年, 107)

然而，當這種死亡本身其實是整個檔案象徵構成的一部分的時候，我們要怎麼理解「死亡驅力」是如何對象徵秩序施展「暴力」的？這種「暴力」並非單純是對於特定項目、對象的各方攻擊，而透過某種無法受到已知象徵體系限制的過剩，進而擾亂原先事物的正常運作。(Žižek, 2012 年, 56-57) 我們可以把例子放在馬克思主義者華特·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 1892 年－1940 年) 的最後一個文本《歷史哲學論綱》(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中。在《歷史哲學論綱》之中，班雅明把歷史設像成為一系列「終將實現」之文本，而這些事件的歷史維度意義都在事後透過象徵網絡的紀錄得到決定。(Žižek, 2002 年, 187) 在這裡，班雅明可以說是提出了作為非歷史性內核的「死亡驅力」。相較於假定國家的存在本身是奠基於共同至善的觀點，班雅明則是提出革命與象徵性死亡、第二次死亡之間密切相關之處。在由革命開創的救贖 (redemption) 與啟示 (apocalypse) 兩種選項之中，前者將回溯性地把意義賦予給被進步 (progress) 的連續體中排除出去的事物，而後者則意味著將遭受到第二次死亡。(Žižek, 2002 年, 198) 實際上，班雅明同樣在《暴力批判》(Critique of Violence) 中將這種真正毀滅性的暴力行為納入「神學」維度，將其視為是神的暴力與至高無上 (sovereignty) 的領域。這樣的暴力行動而其原因在於律法只限於生命體，不能作超越生命體而觸及作為純粹生命的東西，也就是死亡驅力「過量性」

(too-muchness) 的範疇。因而，神的暴力也是純粹驅力 (pure drive)、不死性 (undeadness) 的另外一種表達。(Žižek, 2012 年, 173-175)

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終於從死亡驅力（及其相應檔案熱）與單純的檔案紀錄問題加以區分開來，而是將其視為是能夠內在於檔案、卻又不斷反對檔案建構的資料，並且在最終與神聖性的暴力問題進行連結。這樣的本體論構想意味著，檔案與資料本身存在著最為重大的差異並非在於兩種建構技術方式的差異，而是兩者之間的動力學機制的差別。對於檔案來說，為為了彌補那個失落的空缺，人們必須透過各式各樣的象徵－文化秩序安排來試圖彌補這個缺陷，而這也是為何德希達會說檔案是會出現記憶失落、斷裂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存在著可以將其視為檔案之死亡驅力的資料，這個資料本身一方面是對於前面檔案的內部成分，另一方面卻又是整個檔案秩序面臨挑戰或解體的問題所在。對於資料來說，我們不應當將其只是視為是透過各式技術蒐集而來的資料運用（這種理解會導致資料與檔案的概念相差不大，至多只在蒐集範疇的差異），而是要進一步發展其被當前電腦資訊意義掩蓋的含意。實際上，資料的種種個性正是對於仰賴文化－象徵秩序之檔案的反叛或不服從，它只是以最少的方式去配合檔案的運作，並且在檔案過度偏移至他處時標記這個檔案的偏移之處。也正是因為這種相對於檔案偏移的固著，我們才終於可以理解為何資料存在著某種神性與不可質疑性，而這兩種性質本身卻又是對於檔案存在的潛在破壞。至此，資料即檔案熱，尤其是那個偏向死亡驅力的部分。

結語

在上述討論之中，我們將德希達的檔案熱進行更為細緻的區分，有意區分出對於不斷將材料加以檔案化的慾望，以及暗中存在著破壞這種檔案慾望的死亡驅力，並且將這種死亡驅力視為是資料真正的本體論。對於「死亡驅力」的存在，齊澤克認為我們應當要先認識其各種涉及層面，並在此基礎上達成暫時性的妥協：

（死亡驅力）這一激進的否定性之維，不能化約為異化社會環境的一種表述，它是這樣界定人類境遇 (la eondition humane) 的：不存在解決方案，也不能迴避它；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克服」、「消滅」它，而是向它表示讓步，學著認識它各種可怕的維度，然後在這個基本認識的基礎上，試著與其達成暫時的妥協。(Žižek, 2002 年, 6-7)

我們在第二章提到，羅森堡提出資料本身在過去便有著不可質疑之給予物的定義，而即便是近日也出現能夠永恆存在的特性（相對於檔案的錯誤本身可能意味著需要從別處彌補其價值，錯誤的資料本身似乎仍然還是持續具有某種意義）。而對於我們來說，這其實就是死亡驅力所帶動的兩種死亡之間所創造的不死空間問題。對於精神分析學來說，「兩種死亡的位置之間」的位置其實就是原質所處的位置，是位處象徵秩序中間的真正創傷性內核。這個位置是由符號化、歷史化的過程所開啟的空位存在，象徵網絡便是圍繞著這個非歷史的內核構築起來。齊澤克這麼形容：

人類的歷史正是透過引證這一非歷史的場所，與動物進化區別開的。非歷史的場所是無法被符號化的，儘管它是透過自身的符號化，被回溯性地創造出來的。一旦「殘忍」的前符號性現實被符號化 / 歷史化，它就會被「隱匿」、隔離原質的、空洞的、「難以消化」的場所。(Žižek, 2002 年, 186)

如果我們把資料等同於死亡驅力，那麼其本身所代表著這種原質空位的本體論，其實一方面提供了用來設想能指網絡整體性之可能性，以及其後續全面滅絕之可能性的思想資源。齊澤克指出，只有當現實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實現符號化 / 歷史化，並且被記錄至象徵網絡之後，我們才能設想「第二次死亡」代表了將傳統歷史整體性全面「擦掉」(wipe-out) 的可能性，而這將會是由象徵化 / 歷史化過程的自我破壞性完成的。因此在某種部份，我們可以透過這點又重新回溯到資料本身的兩面性質，一方面是對於記憶檔案整體的記憶協助與驅動，另一方面又不斷標記著這種記憶載體的不可可能性，並且不斷在背後對於這樣的整體記憶進行挑戰。正如同佛洛伊德在對於死亡驅力分析時的游移不決與痛苦，德希達對於檔案熱之中其實也存在著兩個不同面向的動力解釋等待分析。而對於檔案和資料來說，它們之間的關係儘管是相當緊密或者複雜的，然而唯有透過資料分析將能夠帶給我們一種為何能夠顛覆檔案的動能。就在這裡，我們才可以重新追溯到班雅明對於顛覆整個歷史敘述的理解，而這也將是為何資料策展肯定是會對於檔案策展的破壞與重構。

參考文獻

- Benjamin, W. (1999 年). 本雅明文選 (陳永國 & 馬海良, Eds.).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Derrida, J. (1996).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E. Prenowitz, Tra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ud, S. (2007 年). 一種幻想的未來 文明及其不滿 (顏志軍 & 張沫, Trans.). 上海人民出版社.
- Hui, Y., & Stiegler, B. (2016 年).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Lacan, J. (2001 年). 拉康選集 (褚孝泉, Trans.). 上海三聯書店.
- Rosenberg, D. (2013). Data before the Fact. In L. Gitelman (Ed.), "Raw Data" Is an Oxymoron (pp. 15-40). The MIT Press.
- Žižek, S. (2002 年). 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 (季廣茂, Trans.). 中央編譯出版社.
- Žižek, S. (2012 年). 暴力: 六個側面的反思 (唐健 & 張嘉榮, Trans.). 中國法制出版社.
- Žižek, S. (2014 年). 視差之見 (季廣茂, Trans.). 浙江大學出版社.

